

中國「大國外交」戰略意涵之研析

海軍陸戰隊上校 夏宜嘉

提 要

- 一、本文主探究中國推行「大國外交」的國家利益所在，並以金融風暴案例引證中國以大國的姿態逐漸引導國際體系的發展趨勢。
- 二、中共目的乃在達成「多極化」世界，其最高的戰略意涵非僅是一個「新興大國」或「負責任的大國」，而是爭取區域的主導權，換言之，中國「不稱霸」但是要「爭王」。
- 三、中共係藉由「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聲明，創造與主要強國共同的利益連結，使中共步入二十一世紀時，感覺國際環境與周邊環境更安全、更有秩序；此舉符合前述中共外交的首要目標，即創造與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
- 四、金融風暴所帶來的重要意義在：正視中國崛起的事實，無論是全球金融秩序重建、環境變遷與節能減碳、美中貿易逆差的減緩等重要議題，美國皆須要中國的支持與合作。
- 五、中國雖然屢次強調「永不稱霸」，然而在多極體系中，大國即是其中一極，中國自認為諸多大國之一，因此，雖不稱霸，但仍會成霸，未來中國的「大國外交」發展方向亦將持續朝向此目標前進。

關鍵詞：大國外交、外交政策、大國關係

前 言

在國際冷戰背景重組與轉換之際，國際社會正在由一個互相對峙的氛圍逐漸走向和解，其突顯一個和解的、多元的、交融

的體系，但亦隱含了暗潮洶湧的新一波權力競爭；因此杭廷頓認為文明衝突的危險仍然是可避免與解決的，因為文明衝突的避免有賴於世界各國接受並合作維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質，且有賴於文明核心國之間

遵循三個遊戲規則：「即避免原則、共同調解原則和求同原則^①。」因此「未來的世界是一個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沒有一種文明是普世文明，每一個文明都要學習與其他文明共存。」在這種尊重差異求同存異的大前提下，中國推行「外交」的具體策略，就是採取各種「夥伴關係」來建構結盟策略，而此種策略究竟有何意涵，則為本文研究之目的。而研究途徑，採取歷史研究途徑，希從現實主義觀點，透過中國的「大國外交」為主軸的發展歷史軌跡，以檢驗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選擇與構想之戰略意涵，在研究方法方面，係採用「文獻分析法」，研究範圍自1991年後冷戰時期迄2009年止，探究中國推行「大國外交」的國家利益所在，並以金融風暴案例引證中國以大國的姿態逐漸引導國際體系的發展趨勢；至於中國的外交決策形成、模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外交活動，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中國「大國外交」內涵

「大國外交」一詞，在中國官方與黨政文件中並未有明確的宣示及定義，也並未像「三個世界」或「獨立自主和平外交」一般，成為中國既定的對外戰略^②。因此要探

究中國「大國外交」的戰略意涵，首先要對何謂「大國外交」做一定位，因為「大國」的概念與「多極化」、「大國關係」與「大國外交」彼此間，具有密切關聯。無論從發生的時間順序，或是從推論的邏輯來看，中國的「大國」概念必然要先行於世界「多極化」、「大國關係」與「大國外交」。沒有某種關於自身之「大國」的認識，則世界「多極化」、「大國關係」就純為其他主要國家的彼此關係，自己則僅是國際關係結構中，選擇甚少的弱勢行動者，更遑論操作「大國外交」策略^③。所以在探討中國推展「大國外交」的現在與未來，我們可以從中共建立「多極化」世界的「新興大國」著眼，換言之，無論從現實主義或從理想主義的觀點觀察中國用語，目的乃在達成「多極化」世界，因此其最高的戰略意涵非僅是一個「新興大國」或「負責任的大國」，而是爭取區域的主導權，換言之，中國「不稱霸」但是要「爭王」。

故對於中國推展「大國外交」戰略意涵的觀察，應有現在與未來之階段劃分，例如若僅討論當前中國崛起成為「新興大國」或「負責任的大國」，那麼「和平與發展」則可視為中國推展「大國外交」的現在式。而

註① 山姆·杭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頁361、351、366、370。所謂避免原則，係要求各個文明核心國避免介入其他文明的衝突；而共同調解原則，則是要求核心國透過協商遏制與消弭彼此文明間的斷層線戰爭；至於求同原則，則是要求各個文明都應該尋求並努力拓展與其他文明在價值觀、慣例和習俗方面的共同性。

註② 葉自成，〈中國外交戰略下的兩岸關係〉，兩岸雙贏月刊，第17期（2000年6月），頁22。

註③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年），頁51。

「大國外交」究竟是「以大國姿態、立場與各國遂行外交」或是單純的「和大國遂行外交」，這兩種不同的主客觀點，筆者認為概可從兩岸不同的角度來觀察：

一、我國學者對中共「大國外交」之觀點

台灣學者大約自1998年起，開始對有關中國「大國外交」議題加以討論，學者張登及指出，台灣較多學術文獻將「大國外交」現象，直接作為既成事實分析，其中既有富含價值的成果，但也引發進一步探索的需要。換言之，台灣研究成果對於冷戰後中國「大國外交」應作為分析性概念，還是成形的具體政策尚無共識，對於其概念內容與觀察重點也有所不同^④。石之瑜先生認為，國內學者多從古典現實主義，直接分析被視為既成政策的「大國外交」，而較少注意到與定位、認同問題有關的「大國」^⑤。據此，將其主客觀性略加區分如後：

(一)將中國「大國外交」視為「以大國姿態與各國交往」：

如學者邱坤玄認為，中國「大國外交」

格局以建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為工具，已經大為提升其國際影響力^⑥。而學者董立文認為，由於中國綜合國力上升，只要中國經濟發展持續快速、軍事力量持續增強，夥伴外交持續深化，中國就會自認為強國，並讓其他大國承認其大國地位^⑦。李登科先生則認為，冷戰結束後，中國以大國自居，並且積極推動「大國外交」，與各大國建立夥伴關係，是中國拓展大國外交的重要手段^⑧。

(二)將中國「大國外交」定義為「與大國交往」者：

趙春山先生認為，中國強調「大國外交」，是因為中國根據當前國際戰略格局分析，大國關係是決定未來國際戰略情勢發展的關鍵因素^⑨。學者于有慧認為，不論是為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或是為發展經濟，中國皆須與大國保持友好關係，故中國採行「大國外交」，係對當前國際體系本質研判後得到的結論^⑩。

二、中國學者對中共「大國外交」之觀點

自中國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

註④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頁21。

註⑤ 石之瑜，〈誰來解讀中共的『大國外交』—兼論現實主義之外的兩岸關係論述〉，發表於台灣與中國大陸關係史討論會（台北：國史館主辦），2000年11月24日。

註⑥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1999年夏季），頁23-38。

註⑦ 董立文，〈論中共的『大國』意義及其問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6卷第2期（1998年12月），頁65-76。

註⑧ 李登科，〈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略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第15期（2000年12月），頁33-163。

註⑨ 趙春山，〈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緒論〉，中華歐亞基金會主編，（台北：大屯出版社，200年），頁1。

註⑩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3期（1999年3月），頁45-61。

對自身的身分定位經歷「社會主義中國」、「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負責任大國」等，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有不同程度的強調¹¹，這些不同的側重點都是行為體在自然屬性的基礎上根據不同的利益訴求而形成的社會角色。當然，作為研究者來說，可以根據研究的需要確定分析的側重點。如對中國國家身分的分析側重於中國對主流國際社會的認同身分上¹²；另外亦有特別重視與國際上其他主要行為者的關係，也就是「大國關係」者，則專以「權力平衡」的角度闡述中國外交環境¹³；此外亦有一觀點，其並非中國外交論述主流，係認為中國與大國間的關係為「夥伴關係」¹⁴。筆者概略整理如後：

(一)將中國「大國外交」視為「以大國姿態與各國交往」：

學者張驥係以權力和平轉移的條件來看中國崛起的外部條件，進而分析中國「大國外交」與國家間相對權力分配變化的發展

方向¹⁵；而鄭必堅先生從理想主義觀點，強調中國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等「軟國力」的部分，以「文明復興」作為衡量中國「大國」的指標，認為和諧世界理念的落實，就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大國外交」的展現¹⁶；王逸舟先生認為中國的全球性責任和利益，是未來5-15年的遠景，對中國而言，目前仍然以區域性責任為主，所以中國應該成為負責任的東亞大國，努力維持區域的安全穩定，增加合作與互信¹⁷；吳健民先生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後，為中國帶來巨大變化，也使世界獲得巨大利益，歷史上大國崛起，走的都是擴張的道路，而中國走的卻是一條和平與發展的道路¹⁸。因為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後，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產生相當程度的疑慮，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責任，中國要成為一個「和平崛起」且負責任的大國¹⁹。

(二)將中國「大國外交」定義為「與大國

註¹¹ 肖歡容，〈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地區主義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第46-51頁。

註¹² 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頁。

註¹³ 閻學通，〈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13。

註¹⁴ 石之瑜，〈解讀『大國外交』：論兩岸差異〉，政治科學論叢（台北），第13期（2000年12月），頁154。

註¹⁵ 張驥，〈權力和平轉移的條件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外部條件〉，國際觀察（北京），2006年第4期〔2006年7月〕，頁41-46。

註¹⁶ 鄭必堅，〈中國夢與世界大事〉，外交評論〔北京〕，2006年第2期（2006年2月），頁13-14。

註¹⁷ 王逸舟，〈面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尋求及其平衡〉，收錄於金燦榮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大國戰略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月），頁147-163。

註¹⁸ 吳健民，〈把握時代特點走和平發展道路〉，外交評論〔北京〕，第84期〔2005年10月〕，頁6-12。

註¹⁹ 2005年9月21日，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羅伯·佐利克〔Rober B. Zoellick〕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辦的晚宴上，發表題為「中國何去何從：從成員到責任」的專題演講時指陳：「應該鼓勵中國

接續下一頁

交往」者：

王緝思先生指出，冷戰後，美國在其全球戰略中沒有以中國為主要對手，但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卻越來越明確以中國為主要對手²⁰。金燦榮先生、周鑫宇先生指出，美國東亞政策出現新特點，那就是開始以接觸政策為主，相應調整大國關係，美國的東亞政策與中國國家利益關聯度最高。美國應當審慎將發展與鞏固大國關係及區域主義的發展加以協調²¹。

三、中國官方對「大國外交」之立場

中國對於自我的期許，既受制於其在國際格局中的大國地位，有著國際與區域國家對中國的期待，同時也受制於其實力的侷限；這對於中國的「外交」戰略方針的制定，實有相當重大的指導與影響。這些因素在中國與世界各大國建立各項聲明或是重要國際場合的宣示中，卻常常隱而未發的顯示，其欲成為大國之立場。諸如：

(一)199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葉爾欽（Yeltsin Boris）所簽訂的「中、俄聯合聲明」第四點中指出：「雙方

互相視對方為在多極化體系正在形成條件下，維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國」²²。

(二)1996年7月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參加東協區域論壇（ARF），承諾中國將「致力於區域和平發展，履行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和義務」²³。

(三)1997年5月法國總統席拉克（J.Chirac）訪問中國，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決定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夥伴關係²⁴。

(四)1997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簽署之「中、美聯合聲明」中指出：「中、美作為亞太地區的大國，願加強合作共同對付面臨的挑戰」²⁵。

(五)1998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簽署「聯合宣言」指出，中、日兩國作為亞洲和世界有影響的國家，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方面負有重要責任。雙方將在國際政治、經濟及全球性問題等領域加強協調與合作，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及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積極貢獻²⁶。

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在諸多國際問題上，美國除了與中國合作，沒有更好的選擇」。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中文網站，2005年9月22日，<http://usinfo.state.gov/mgck/Archive/2005/Sep/22-769678.html>。

註²⁰ 王緝思，〈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北京），第84期（2005年10月），頁13-16。

註²¹ 金燦榮、周鑫宇，〈美國東亞政策的新特點〉，國際觀察（北京），2006年第5期（2006年10月），頁11-20。

註²² 〈中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北京），1994年9月4日，第1版。

註²³ 〈中共年報〉，中共研究雜誌社，1997年版，第一部分，頁32。

註²⁴ 〈中法聯合聲明〉，人民日報（北京），1997年5月17日，第1版。

註²⁵ 〈中美聯合聲明〉，人民日報（北京），1997年10月30日，第1版。

(六)1998年4月，中共與歐盟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長期穩定之建設性夥伴關係」。

這些夥伴關係的名稱雖然不同，內涵亦非建立聯盟（alliance），而是搭建彼此互惠的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由於這些聲明的文意抽象，並無安全承諾，且合作範圍限於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然值得注意的，這是中共推動多極化，強化自身安全的重要步驟，目的亦在防範大國聯手對付中國²⁷。

小 結

綜觀以上論述，大多數台灣學者對於中國推行的「大國外交」的研究方向，多從現實主義觀點切入，認為中國綜合國力崛起後，國際事務影響力增加，「大國」的條件已然具備，故採行其以「大國姿態與各國交往」之認知加以分析。進而推斷中國所推行之各種形式的「夥伴外交」，尤其是「戰略夥伴」關係，即是中國推行「大國外交」的具體展現。而大多數中國學者對於中國推行的「大國外交」的研究方向，亦從現實主義觀點，採行其已成為「成形的具體政策」之認知加以分析。然有少部分學者對於中國的「大國外交」，著重於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文化的復興」、「負責任的最大發展中國家」等論述。對於中國綜合國力崛起後，

國際事務影響力增加，「大國」的條件已然具備等議題，則採迴避之態度；相較於中國學者，台灣學者較能從現實主義角度，直接切入對於中國推行「大國外交」的政策面分析，也因此具有較強的時事研判趨向。中國學者之研究成果雖然也頗多採用現實主義觀點，但描述過程與其官方所發布的政策相似度較高，有著為中國官方的政策護航之虞，且其結論常具有理想主義色彩。

在官方聲明中，俄羅斯直接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中法聲明中雖未明確承認中國「大國」地位，但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建立，使得中國國際地位與法國相提並論，顯示法國間接承認中國的國際地位；美國承認中國具有「亞太大國」地位，日本則承認中國為「亞洲和世界有影響的國家」。換言之，無論是從名稱上確定的大國、或是與大國成為夥伴關係的平等地位，乃至對世界負責期許內涵，可以觀察出中共係藉由「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聲明，創造與主要強國共同的利益連結，使中共步入二十一世紀時，感覺國際環境與周邊環境更安全、更有秩序。此舉符合前述中共外交的首要目標，即創造與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目前很難預估這些雙邊關係的走向，但中共以主動方式，引導大國關係的企圖心，已見端倪。若從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在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註²⁶ 〈中日聯合宣言〉，工商時報，1998年11月27日，第8版。

註²⁷ 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一期，民國93年9月，p42、31。

Constructivism) 中所主張：「國際社會的行為體在互動之過程中分享彼此的觀念，增加對彼此瞭解與認識，並進而形成國家的身分和利益的建構之論述。」觀點²⁸來解釋中共的國家行為受到外在國際社會的制約而產生其行為的改變，筆者認為中國確係以一個大國的姿態，在國際體系中遂行其「大國外交」之政策。

中國「大國外交」政策的嬗遞

一、後冷戰時期東亞國際戰略情勢轉變

冷戰期間，中國受兩大陣營對峙和社會主義國家間內部矛盾影響，與部分周邊國家存在一些矛盾甚至衝突，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由二極轉變為一超多強，其根本因素乃與美、俄調整外交戰略有關；而這種調整對世界形勢、亞太政治和安全格局以及中共周邊的安全就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獲得改善，安全環境獲得保障。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完成、中國與東盟國家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東盟與中、日、韓為主的東亞合作不斷擴展、東盟地區論壇確定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管道等，都對促進地區安全合作產生效用，印巴緊張局勢緩解，兩國保持和平對話狀態等，都對中國的安全感提供相當大的助

益。

然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仍處在調整時期，特別是美國的安全戰略和日、韓政策的調整使得亞太地區安全形勢中的複雜因素也在增加，北韓反覆無常的核武策略，形成朝鮮半島在東北亞的衝突與矛盾，均對中國處理國際衝突事件的能力形成新的挑戰。

二、大國概念與自主與和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對理論的概念與西方國家不同，對中國而言，所謂的「外交理論」指的是一套用來實踐、奉為主臬的說法²⁹。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基於反對俄國的「大國沙文主義」、美國的「帝國主義」以及「支持第三世界」等原則，「大國」的自我定位，對於中國官方而言，始終是個禁忌。迄鄧小平主政時期，依據鄧小平對於國際局勢趨於和平的判斷，中共對外政策的重點逐漸從主要維護國家安全轉向擴大國家經濟利益³⁰。基於「大戰打不起來」的基本認識，使其在所處的國際和平環境下，將經濟建設置於國家首要的戰略利益位置上³¹，據此，中共遂全力發展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學者許志嘉針對鄧小平主政時期所提出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歸納為「醞釀期」、「發展期」與「成熟期」三個階段³²。因中共進入改革開放的70年代末期，才

註²⁸ Alexander Wendt, 〈國際政治中的三種無政府文化〉, 美歐季刊, 第15卷, 第2期, 頁155。

註²⁹ 于有慧, 〈中共的大國外交〉, 中國大陸研究, 頁45-61。

註³⁰ 閻學通,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頁263。

註³¹ 閻學通,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 頁103。

註³² 許志嘉, 〈鄧小平時期的中共外交政策〉, 問題與研究《台灣台北》, 第36卷第7期, 1997年7月, 頁37-40。

真正認識到本身的落後，並且認識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科技革命與經濟發展對國際社會產生的影響，而當時的中國即體認到大國之間的互動，將會決定未來國際體系的運作與穩定，因此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其綜合國力。然要建構「發展」必需先有「和平」的觀念；這可說是中共在參與國際社會後逐漸認識自我的一個定位調整歷程。在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後的「獨立自主」，意味著中共要「獨立自主」於美、蘇強權之外，既不「東倒」也不「西歪³³」，「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³⁴」其「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參加任何集團，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誰搞霸權主義我們就反對誰。³⁵」。

三、從衰弱大國到發展中大國

1985年鄧小平在談到中美蘇大三角關係對於中國自身的國際定位做出概念性的界定：「中國算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是小國。³⁶」「所謂大國就是人多，土地面積

大，所謂小國就是，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比較窮…。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小國，但是又可以說中國是名副其實的大國。³⁷」鄭必堅先生更為具體用兩道最簡單的數學題（乘法題、除法題）進行說明。即在中國無論看似多麼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難點，只要乘以13億（指的是中國的人口），那就成為一個大規模、甚至可能是超大規模的問題；無論絕對數量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相當低的、甚至很低的人均水準³⁸。由此可見，中共由自我身分界定國家利益發展途徑時是與國際其他成員比較而來。中共既然認知與界定本身在國際社會中具有大國與小國雙重身分，因此中共在制定外交戰略之時，即明確認定其「不能盲目自大，又不可妄自菲薄。既要量力而行，又要有所做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務³⁹」。

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軍事等領域崛起而進入「大國」之列，從區域霸權之基乃至有問鼎全球霸權之勢。如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核武且

註³³ 尹慶耀，〈中共獨立自主對外政策的由來與發展〉，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1月，第25卷第1期，頁15。

註³⁴ 鄧小平，引自〈<http://www.ccyl.org.cn/theory/dspws/page3/wenhu.htm>〉，中國共青團，2004年9月20日。

註³⁵ 鄧小平，引自〈<http://www.ccyl.org.cn/theory/dspws/page3/zhengqu.htm>〉，中國共青團，2004年9月20日。

註³⁶ 鄧小平，〈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984年10月26日，頁94。

註³⁷ 鄧小平，〈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94。

註³⁸ 鄭必堅，〈和平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極重要的“中國特色”〉，《學習時報》2004年6月14日。

註³⁹ 阮宗澤，〈與世界相處〉，匈牙利新導報特稿，第193期，2004年9月29日，<http://www.xindb.com/193/tegao1.htm>。

為世界第五大武器出口國、第三大貿易國、第三個完成太空人上太空的國家及第一大外匯存底國等，其日益增強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實力，在在都使得中國於國際社會上，有著發揮更大影響力的空間。中國的綜合國力提升後，作為世界五大主要力量之一，以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外交戰略對國際秩序顯然有重要的影響⁴⁰。

四、「大國關係」概念的調整

從1991年冷戰結束、兩極體系崩解，中國認為未來的國際體系將朝向「多極化」世界發展，而「大國關係」是決定未來國際戰略情勢發展的關鍵因素⁴¹。1994年，中國在與俄羅斯締結的「聯合聲明」中，首度在官方正式檔裡，使用有國際政治意含的「大國」概念，迄1997年，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提出「大國關係深刻調整，多極趨勢加速發展」論述後，更進一步為其內部關於「大國」的自我定位打開討論空間⁴²；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會議時，首次在重要場合提出要加強發展與「發達國家」間的關係⁴³。此一原則，即成為中國官方推行「大國

外交」之理論的基礎與起源。

五、金融風暴對中國的契機

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之際，面對美國成長趨勢減緩，全球經濟機構無不對中國經濟寄予厚望，認為期將繼美國之後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2008年初，復出現中國經濟「脫鉤論」，認為即便美國經濟衰退，中國經濟仍能一枝獨秀，繼續高速增長；但中國在經濟金融方面能否順利脫穎而出順利取代美國的地位，或是在未來的世界金融體系取得更重要的發言權，是值得觀察的趨勢。

(一)就中國國內因素言

檢視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其蛻變成爲出口導向型的國家，亦逐步發展成爲一個世界經濟大國，也是全球化的受益國，與世界的相互聯繫達到有史以來的緊密，故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風險必然會對中國造成衝擊。在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經濟最大的挑戰就是外需下降的同時，內需跟不上；現今中國在全球貿易夥伴不同程度地遭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的情況下，中國面臨的內需市場不足尤甚於當年。

1.次貸危機的影響

註⁴⁰ 所謂世界五大主要力量即為「一超四強」；一超是指美國，四強是指歐盟、俄羅斯、中國、日本。所謂「一超」（唯一超強），依台灣大學明居正教授的定義；係其他四強與美國之間，就一對一的綜合實力而言，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不是美國的對手。但美國仍不能為所欲為，仍須與四強合作。而四強之間的關係為「既合作又競爭」，合作則是為了取得更好的競爭力。

註⁴¹ 趙春山，〈緒論〉，中華歐亞基金會主編，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大屯出版社，2006年6月），頁1。

註⁴² 張德真、朱滿庭，〈大國關係深刻調整，多極趨勢加速發展〉專稿，人民日報（北京），1997年12月15日，第7版。

註⁴³ 〈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文匯報（香港），1997年9月13日，版A10。

觀察中國在2008年第四季的經濟情況，其雖然成長4.3%，但增長率已由10月份的19.2%下降至11、12月份-2.2%、-2.8%；進口情況更糟，第四季下降8.8%，由10月的正成長15.6%，至11月、12月分別衰退17.9%、21.3%，進口的急速下降顯示中國的內需正在下滑⁴⁴。

2. 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措施

中國的專制政體使得中國在此種風暴中受到極小的影響，索羅斯於2009年3月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演講表示，中國的體制有利於抵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預計中國能更快地從這場影響到全球的危機中解脫出來，並會更加強大⁴⁵；且認為中國在2008年11月的4兆元「擴大投資方案⁴⁶」將成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贏家」。

是以此次全球金融風暴，將是一個契機，可促使中國消費市場由「外需轉向內需」，實現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與升級⁴⁷，促使中國擴大內需，發展國內市

場，徹底改變內需孱弱的境況。

(二) 在國際體系運作上

胡錦濤於2009年04月上旬倫敦第二次G20金融峰會中提出五點舉措，認為國際金融機構應該增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救助，中國亦將支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亦期望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治理結構，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同時也呼籲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和減少國際金融危機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害，特別是非洲國家⁴⁸。而在2009年9月下旬胡錦濤於匹茲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三次金融峰會時表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已兌現對聯合國《千年宣言》所作承諾，向120多個國家提供援助，累計免除49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債務，對40多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商品給予零關稅待遇⁴⁹。中國將繼續本著負責的態度，認真落實各項對外援助承諾和舉措，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更多幫助。

註⁴⁴ 傅豐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經濟，經濟前瞻，2009，May，頁5。

註⁴⁵ 索羅斯：中國會迅速擺脫國際金融危機，中國證券網.上海證券報，<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2/n263162024.shtml>（0109日查詢）

註⁴⁶ 中國擴大投資方案計有十項：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強農村基礎建設、加快鐵路公路機場等重大基礎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災後重建各項工作、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資料來源：傅豐誠，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中國經濟，經濟前瞻，2009，May，頁6-7。

註⁴⁷ 王有康，全球金融風暴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及其因應策略，東亞論壇季刊(EAST-ASIA REVIEW) No.464，2009年6月，頁105。

註⁴⁸ 胡錦濤G20峰會講話提出五舉措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新聞網，<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3/n263177774.shtml>（0109日查詢）

註⁴⁹ 資料來源：楊潔篪外長談胡錦濤主席出席四大峰會成果，中共外交部網站，2009/09/27。<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dnzt/hjtcf090916/hjt090916zxxx/t607292.htm>。（2010年01月09日查詢）

小 結

基於前述歷史因素，中共即決定，為了國家利益與發展的外交政策要以「經濟發展」為國家優先利益；前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2006年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2006年年會上論述：中國的經濟利益需求主要集中在亞太區域，中國的發展也必將給周邊區域的發展帶來機遇、提供引擎⁵⁰。證諸溫特所言，在合作與共利的共同觀念中，區域化經濟組織的成型，使得國際步入以國家之間互為朋友為基本特徵的體系文化，在這樣的文化體系中，國家不會使用暴力解決利益衝突，如果做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脅，另一方會鼎力相助，並不計較自己的得失，這實際上是安全共同體的形式⁵¹。是以冷戰後的國際社會也隨著全球化與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降低，世界各國進入以合作與協商為主要互動邏輯，由於拯救美國金融風暴的需要，美國將會在政治、軍事等方面與中國達成諒解與妥協，化解中美雙方衝突，實現中美兩國利益攸關的合作。此可由歐巴馬2008年底謹慎地將中美關係定位為彼此不視為對手的對華政策宣示瞭解其意涵，而美國總統歐巴馬出訪亞洲，不但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晤，並接受南華早報的專訪，更首次以Town Hall Meeting的方式與上海青年學子面對面交談。可見金融風暴所帶來的重要意義在：正視中國崛起的事實，無論是全球金融秩序重建、

環境變遷與節能減碳、美中貿易逆差的減緩等重要議題，美國皆須要中國的支持與合作。

中共「大國外交」發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和區域化成為當今世界的兩股潮流得到快速發展，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正成為民族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一項重要選擇。在此背景下，中共已越來越感受到衝擊和壓力，認識到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緊迫性。中共開始主動順應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將自己身分定位為亞太國家中一員的前提下，中共把亞太地區做為自己生存發展的基礎空間，因此如何在中共的周邊建構出積極參與亞太地區的新身分，成為中共對自我身分的期許，而這部分在經濟合作乃至於安全合作取得顯著成效。

一、江澤民時期全方位外交

特別是兩極格局解體後，中國認為大國關係不斷調整，多個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大國關係成為構成世界格局的基礎，大國關係穩定，世界就穩定。因此，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十分重視大國之間的關係，在十六大時即明確提出「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把大國關係的調整和改善作為新形勢下中國國際戰略的一個基本布局，中國政府先後與美、俄、日、歐等大國和大國集團建立起各種各樣的「不針對第三者」、求同存異、既相互

註⁵⁰ 參見《人民日報》2006年4月23日。

註⁵¹ 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頁254。

競爭又相互借重的「戰略夥伴」關係；這使大國之間的聯動制衡作用加強，有利於牽制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也有利於中國運用自身的優勢，在大國關係中發揮作用，獲取更加主動的戰略地位。除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外，中國的全方位外交還包括：

(一)「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中國政府積極推進上海合作組織的建設。中國政府大力促進東亞區域合作，推動「10+1」、「10+3」機制取得新突破。

(二)「繼續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中國積極探索與發展中國家開展平等互利合作的新領域、新途徑，取得顯著成果。

(三)「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及區域性組織中發揮作用，積極參與多邊國際組織，並決定與北約這一軍事同盟開展安全對話；在冷戰結束後的新形勢下，多邊主義外交有利於維護和增強中國的國際利益，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安有重要作用。

基此，中國大戰略的主導理念，即以區域優先為重點，其有必要以東亞區域發展為核心，大力促進東亞整合，創立有助於區域經濟和進一步經濟開放的區域性國際制度，為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之便車提供機會，中國推動東亞合作機制代表中國大戰略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

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並逐步確立國家間關係和國際關係的新準則⁵²。

二、十七大後中國外交之新意涵

中共十七大是胡溫體制上臺後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其應能反映出胡溫政權的戰略思維主軸，報告內容中可發現其中影響戰略思維相關的問題，主要區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共的世界觀，即對世界局勢的評估，報告中強調「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國際力量對比較著有利於和平方向發展」；與十六大強調「不會出現世界大戰」、「積極爭取多極化」等措詞的語氣並不相同。

第二部分則是中共的外交戰略與政策方面：

(一)揭示「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的世界「願景」。

(二)與願景相關的「策略」方面，新內容包括「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共同分享發展機遇、恪守國際法準則、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共推經濟全球化朝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以自己的發展促進共同發展」、「地球家園」等。尤其是不斷出現的「共贏」、「發展」等詞彙。

(三)在交往對象方面：先強調發展與「所有的」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而後才是如

註⁵² 門洪華：〈中國大戰略的主導理念〉，載《學習時報》2005年5月2日。

十六大一般的順序（發達國家、睦鄰友好、發展中國家、多邊外交及民間往來）⁵³。

從中共世界觀與政策的文字差異中，所透露出來的訊息為：中共的自我身分認同已經改變，隱然從過去發展中國家身分轉換成為（區域）大國，以及因為確認大國身分後之安全威脅感下降，加上綜合國力上升後自信心的加強所顯露出在國際上大國的身分象徵。

三、全球金融風暴後的發展

胡錦濤在倫敦舉行的G20第二次金融峰會上強調最緊迫的任務是全力恢復世界經濟增長，防止其陷入嚴重衰退。而其論述中提出加強金融監管合作與國際金融機構應該增強對發展中國家的救助並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應切實保持和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之援助。以及對貨幣發行政策的監督、改進治理結構，提高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以健全儲備貨幣發行調控機制，並促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合理化。

其著眼乃在否定 I M F 的現行機制而希望儘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和規範，完善評級機構行為準則和監管制度，並希藉由基金的支援取得在新的機制中的發言權或是主導權，由於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中國也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果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形

成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所有計劃。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呈現出積極跡象。這表明中國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所採取的積極作為，已有主導相關議題的趨勢，特別是中國在峰會中的發言，係以發展中大國領導人自居，要求開發國家落實對發展中國家以及落後國家的照顧，另一方面則以負責任的大國角度切入，提供相關數據強調其對國際社會的貢獻，一則減少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二則儼然以第三世界領導人身分主導峰會議題，企圖在金融峰會上爭取更多國際體系中更多國家的支持，而其強調：國際社會仍然面臨三項重要任務。第一，堅定不移刺激經濟增長。第二，堅定不移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第三，堅定不移推動世界經濟平衡發展。顯示出其企圖掌握此波全球金融風暴契機的主導權。

小 結

當中國外交政策有了主導理念，再推論中國推行「大國外交」的具體方式，就是透過各種「夥伴關係」來形成一種結盟策略。首先透過「議題」的設定，來與其他大國進行競逐，再以全球、區域或兩國的形式建立雙邊或多邊聯盟，結盟後再共同運用「胡蘿蔔與棒子」來擴大影響力，先佔據「有利」之地位並取得利益後，再擴大結盟以取得更大的利益，並取得更「有力」之地位，以達到最終目的。也就是從單一國家透過不斷結盟，成為強大的霸權國家；有步驟地從

註⁵³ 于有慧，〈十七大後中共外交走向觀察〉，國關學報第二十五期，2008年1月，頁176-177。

主權國家變成大國，再成為區域大國、區域強權、世界大國，最後成為世界強權⁵⁴。此乃中國在十六大後，對其外交建構有階段的目標區分，俟進入溫胡體制的新一代領導團體，中共對本身的大國身分已從過去的期盼上升至接受，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有關對外關係部分中一直出現「發展」、「共贏」等詞，很明顯地，中共正努力營造崛起後的大國戰略，特別是在全球金融風暴後，一方面要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一是更多地將本身的經濟實力化為外交戰略工具，以大國身分擴大影響力，真實地扮演大國角色。

中國「大國外交」的效應

一、從國際體制的挑戰者轉變成參予者

袁正清從建構主義角度觀察：中國隨著冷戰前後國際關係中共同觀念的轉換，係肇因於隨著行為體間的互動實踐不同、造成的規範和認同也就不同。規範和認同並不是主體，而是由主體間長期行為實踐所建構的，它們附著於行為體，但並不能還原為行為體

本身，而是具有體系結構的性質。這種結構不僅約束行為體的行為，而且還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身分。身分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也就不同，也因此決定了外交政策的不同；這是一個不斷循環建構的過程。所以，一旦行為體在互動的過程中被賦予新的身分，建立起新的規範，原先所呈現的國際政治圖景就會發生改變⁵⁵。中共在冷戰後的身分定位隨著國際共同觀念的變遷，其崛起過程即會受到這些國際機制和制度在利益與行為上的制約和規範，之所以引起國際社會如此大的關注，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詳如註釋⁵⁶)⁵⁶；而中共國防大學學者江凌飛教授指出：「是否能成功的關鍵主要是由歷史決定的，不完全是由國家本身能主動決定的，也就是指出中共的崛起，客觀因素的制約要大於中共的主觀因素，主觀須配合客觀的形式才能趁勢而起⁵⁷。」他也指出：「大國崛起都有一定的歷史時機和條件，中共也需要一個歷史條件，全球化能否成為這個條件，應該關注『9·11』以來國際形勢的

註⁵⁴ 郭大文，〈後冷戰時期中國大國外交策略的論述與發展〉，國立台灣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5。

註⁵⁵ 袁正清，〈建構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2004年9期，頁9。

註⁵⁶ 「一、中共是一個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上有廣泛的建構，其崛起必將引起世人的關注；二、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發展走向會引起別國的關注；三、中共的周邊多事，所以中共崛起分外引人注目；四、歷史上，一個大國的崛起會導致國際關係的變化，國際格局的變動甚至導致戰爭。」〈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社會與國際戰略〉，人民網學習時報社，2004年3月25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548118.htm>。

註⁵⁷ 〈專家縱論中國「和平崛起」經略〉，2004年04月08日，中國新聞網，《國際先驅導報》；<http://61.135.142.194:89/gate/big5/www.chinanews.com.cn/n/2004-04-08/26/422976.html>。

轉化。中共有兩個不同，一是國家特性（身分），中共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二是中共的國際角色（身分）現在和過去有所不同，從國際體系的反對者到積極參與者，從戰略舞臺中的弱者到舞臺中心。這些都是中共和平崛起的關鍵因素⁵⁸。」

二、從「和而不同」轉向「有所作為」

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曾多次強調世界的多樣性，並明確提出「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和而不同」的涵意是：「在承認世界多樣性的同時，積極尋求各國利益的交匯點、擴大共識，妥善處理分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提倡多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追求國際社會的和諧進步。」而其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中分別提出：要「尊重世界多樣性⁵⁹」並「維護世界多樣性」⁶⁰。這表明「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成為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正式定調。中共的十六大報告系統地闡述了中國「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的外交理念，它實際上是對「和而不同」的另一種詮釋。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時亦指陳：「多樣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徵」「我們應該維護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⁶¹。鑒於冷戰結束以後，武

裝衝突和局部戰爭對世界全域的建構明顯減弱，國際社會的調解努力日益增強、能力不斷提高；軍事因素在國家安全中雖佔有重要地位，但經濟安全在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中的位置變得更加重要，而正是由於上述的定位符合東亞後冷戰時期對於和平渴求的共同觀念，尤其是亞洲各國政府將歧見擱置以便集中全力於經濟發展上⁶²。基此，當前的中國外交的定位即：在「韜光養晦」的同時，注重「有所作為」。其具體含義是：中國將更全面地關注國際事務，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更負責地處理國際事務。中國的「有所作為」外交活動正是從這方面入手。

三、從「韜光養晦」至「與時俱進」

十七大政治報告中所透露出來最重要的訊息即中共已接受新的「大國」身分認同，走出過去的弱國認同，接受本身已由「發展的中國」轉變為「崛起的中國⁶³」在新的身分認同下，中共的外交戰略與過去以追求自身「發展」為主有所不同，政治報告中一再強調「共同發展」、「雙贏」，並直言「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顯示中共新的外交戰略是更加重視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⁶⁴。中共已完全走出原來的發展中國家外交

註⁵⁸ 〈專家縱論中國「和平崛起」經略〉，2004年04月08日，中國新聞網。

註⁵⁹ 江澤民文選第2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P40。

註⁶⁰ 江澤民文選第3卷1，P567。

註⁶¹ 胡錦濤，〈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人民日報，2003年05月29日。

註⁶² Zalmay Khalilzad, "U.S. Grand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Strategic Appraisal 1996, sous la dir. de Z. Khalilzad,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6, p. 1.

註⁶³ 袁鵬，〈中國崛起與中國的國際處境〉，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10期，頁20。

戰略，轉向具有大國思維的外交模式。從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可看出中共新的外交戰略思維具有以下重點：

(一)強調「全方位」交往，顯示中共將不再以結盟方式遂行外交目標；

(二)強調「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代表中共開始願意以本身的在發展本身經濟的同時，也考慮本身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變化⁶⁵。

特別是中國更全面關注國際事務。從領域與地域等兩方面來說，中國所關注的國際事務都比以往更加全面。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中國對國際事務的關注，逐步由以前的集中在政治領域擴展到經濟、文化、環境、體育等各個領域。這一具有外交政策含義的論述向世界宣示：中國尊重國際社會的現實，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並將實踐其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加強國際合作的外交宗旨。

2005年9月15日，在慶祝聯合國成立60周年元首峰會上，胡錦濤向全世界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主張。他指出：「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應該加強不同文明的對話和交流」，「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

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相容並蓄的和諧世界⁶⁶。」此一論述顯示中國在大國外交的基礎上將更進一步企圖融入國際社會，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認同，進而達到多元並存的目的。

四、建構發展空間與提升國際地位

(一)建構發展空間

胡錦濤在2005年底訪問越南時說：中國將堅定地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⁶⁷。質言之就是：「經濟相互依存、區域一體化和地區多邊合作機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確保周邊環境穩定的重要理念和工具。立足於本地區的共同發展，在中國崛起的同時，讓亞洲國家發展得更好。⁶⁸」因此中國學者提出「夥伴關係」，認為中國應成為「負責的大國」，此一論點強調國際上不必然存在二分法的對立關係，認為大國間可以有良性循環，可藉由國際間的協調、夥伴關係的強化或有力的國際組織獲得國家利益。此一論點受到中國官方相當重視，目前已成為主流論述。尤其是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其國家實力及其國際影響力一直處於上升狀態，儘管國際上不時出現中國威脅

註⁶⁴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頁21-23。

註⁶⁵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8期，頁8-13；秦亞青，〈和諧世界：中國外交新理念〉，前線，2006年第12期，頁30-32。

註⁶⁶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

註⁶⁷ 《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日。

註⁶⁸ 黃仁偉：〈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頁。

論、中國崩潰論等論調，但大多數戰略分析家所持的預測是中國正在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只是時間問題⁶⁹。

(二)提升國際地位：

中共學者袁智兵從建構主義的國家社會化觀點定位中共國際身分，他認為：「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提升，關於中共的國際定位問題引起廣泛爭論與探討。對中共的國際定位，既要充分、客觀地考量中共的國情，也要參照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只有對自己的國際定位有清醒、客觀、辯證、全面的認識，才能在和平崛起的進程中趨利避害、未雨綢繆。」他也歸納出中共國際定位的十個基本界定與認識：中共是個大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地區性大國、和平崛起中的大國、負責任的大國、國防支出相對較低的核大國也是個未完成統一的大國⁷⁰。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則說：「（中國）要堅持把繼承傳統與改革創新結合起來；把立足中國同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積極建設和諧中國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結合起來。」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也稱：「中國外交很長時間以來是反應外交。隨著國力增強，中國進入了主動外交的

外交黃金時期。構建和諧世界從國際關係層面來說，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貢獻。⁷¹」

五、掌握重要議題建構領導威信

在金融議題與環境保護議題上，未來中國是否得以取得對西方主導權的平衡，有賴於中國能否整合與領導其他主要開發中國家（如印尼）乃至落後國家（非洲國家）等，發揮集體的力量，以改變全球秩序的面貌。其次，中國如有意成為具實際影響力的體系中大國，除了以美國為對象的美元議題外，更需要有建設性與前瞻性的議題設定能力，包括氣候變遷與能源安全等課題，才能以開發中國家領導人的角色，擴大其在全球權力體系的發言權。當前的全球性的經濟困境提供中國脫穎而出的機會，但在危機過後，全球新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是否因此有所轉變，仍是一個未知數。然而藉由中國快速的經濟成長，中國已經開始重新形塑全球體系的新面貌。

結語

國家大小強弱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不一樣，大國的影響力有如颶風，主導全球性與區域性國際關係的轉動，而在國際關係的轉動中獲得其最大利益；中型國家隨著大

註⁶⁹ 王緝思，〈「三十年來中美關係的變與不變」〉，中國黨政幹部論壇（北京），第7期（2002年7月），頁36-39。

註⁷⁰ 袁智兵，〈中國國際定位的十個判斷〉，學習時報，2004年1月12日，<http://www.ynce.gov.cn/content.asp?ARTID=5079&COLID=107>。

註⁷¹ 李明，〈「十七大」前後推動中共東北亞政策的「軟權力」〉，東亞研究，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p229。

國影響力的變化而尋求其次要利益；小國只有因應變局在狹縫中求生存。中國是大國，著重大國外交，尤其是對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英國與法國的重視⁷²。大體而言，美國獨霸世界的單極體系已經劃下休止符，如今「美國vs.中國：民主vs.和諧」這一新的體系已然形成⁷³。因此探討中共大國外交，對瞭解東亞的安全環境意義重大。

中國崛起是蘇聯瓦解後，世界面臨的重大議題。回顧歷史，二次大戰後，德、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再崛起時並沒有對外構成威脅。相對過去三十年，中共改革開放亟需外在的資金、技術與合作，更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靠著經濟改革與世界接軌，而中國崛起是否會與德日一般的和平發展，或是新的霸權仍待觀察。然在探討中國「大國外交」的定位時，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係以其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為體，以第三世界領導者為用，透過建構夥伴關係為途徑，以達成其成為多極中的一極為戰略目標，此亦為中共在其十七大報告中所言「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之具體體現；從中共強調「有所作為」和「和平崛起」的外交理念，和突顯「以人為本」的外交風格，以及掌握外交黃金時期，可以窺見中共外交理念發展的新形貌，係以：「大國是核心、周邊是重點、第三世界是基礎」作為中共外交的考量順序。

在各項國際議題中，中國的活動是相當多元且兼具新意與挑戰，中國雖然屢次強調「永不稱霸」，然而在多極體系中，大國即是其中一極，中國自認為諸多大國之一，因此，雖不稱霸，但仍會成霸，除了靠硬實力以外，文化、經濟與國家形象，將是中國發展軟實力的重要項目，此類軟實力將是中國建構其影響力之基礎，未來中國的「大國外交」發展方向亦將持續朝此目標前進。

作者簡介

夏宜嘉上校，陸軍官校正75年班，戰院94年班，現為政治大學外交系戰略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研究生。曾任：營長、科長、海院教官、旅參謀主任；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聯合作戰組教官。

敬請

踴躍投稿

註⁷² 趙國材，〈「十七大」前後中共外交之總體形勢評估〉，東亞研究，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頁225。

註⁷³ 李明，〈「十七大」前後推動中共東北亞政策的「軟權力」〉，東亞研究，2007年1月第三十八卷第一期，頁228。